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分析

丁志刚, 熊凯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呈现三重逻辑: 由管制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由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由服务型治理到制度化治理的历史逻辑; 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吸取国外治理教训的思想逻辑; 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的实践逻辑。这三重逻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色、亮色与特色。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要充分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 以国家治理效能助推国家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 历史逻辑; 思想逻辑; 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5-0162-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历史经验与实践表明,国家现代化必然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能否构建完善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备优秀的现代治理能力,达成高水平的现代治理效能,形成良政善治的局面,是决定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历经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创立、改革开放后的改革发展创新、新时代以来的系统性建构与现代性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实践范式。目前学界对这一范式的研究主要从三种路径展开:一是从“体系—能力”关系着眼,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体两面,提出要“深刻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地位”^[2],“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层面,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层面”^[3]。其中,“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核”^[4],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既要注重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还要有效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具备和增强对外竞争能力^[5]。二是从“政党引领”着眼,突出党的领导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党的领导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了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核心主体”^[6],“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根本领导主体与根本推动力量”^[7],形成了“具有特定的治理目标、特有的治理优势、特别的治理布局、特殊的治理要求以及特大的治理动力”^[8]的治理格局。三是从“治理文明”着眼,基于中西方对比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角度,通过“批判汲取和创造性转

收稿日期: 2023-03-02; 修回日期: 2023-05-09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容结构、内在逻辑与显著优势研究”(20BZZ005)

作者简介: 丁志刚,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
熊凯,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联系邮箱:
dingzhg@lzu.edu.cn

化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9], 彰显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性, 提出从“文化、价值、制度、行为和器物五个维度”全面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面、科学地理解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领悟“中国式”一词的核心要义, 这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伟大成就和具有光明前途的关键所在。对“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什么是“中国式”的概念阐释表层, 而是要深入探讨“中国式”的底层逻辑。因此, 在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背景下,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方兴未艾之际, 从驱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底层逻辑即历史逻辑、思想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对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学理分析, 对全面深入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以“中国之治”的复合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命题虽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的,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未缺席, 并呈现为一个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从历史逻辑层面分析,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遵循从管制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从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从服务型治理到制度化治理的演进逻辑。系统梳理历史逻辑, 可以为今后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提供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

(一) 从管制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中国式国家治理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在国内, 急需要出台一系列契合人民民主政权的制度、法律和政策, 以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 确保新中国新型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 防止敌对分子以各种方式对人民民主政权

进行破坏和颠覆, 并在此基础上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 实现工业化。在国际上,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任务基本完成, 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 经济和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设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中苏关系恶化。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全面展开冷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处境艰难, 既要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 又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此背景下, 国家实施全面管制型治理策略: 经济领域在“一化三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计划经济; 在政治领域展开党内斗争、国内斗争、国际斗争; 社会领域在实施人民公社制度、单位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党和政府的全面管控力度。客观地看, 在此阶段国家采用管制型治理方略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中国式国家治理模式由管制型治理向管理型治理转变的转折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党和国家及时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此后的 20 多年间, 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梳理了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 推进党政机构改革,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政府、企业、社会团体、自治组织、公民共同参与的管理型治理, 成了这一阶段中国式国家治理的显著特点。在此期间, 管理型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也与时俱进: 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发展, 中国式国家治理在整体上实现了从过去管制型国家治理模式向管理型治理模式的转变。

(二) 从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国内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转型加速进行, 国家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加入 WTO 等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 使

得管理型国家治理模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转型、企业转型、社会转型的需要,国家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勇气重新定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精简国家机构为主的体制改革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国家、政府职能重新定位为核心的体制转型,中国式国家治理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现代国家建设中,在持续推进行政管理方式转变、释放市场主体作用、增强社会主体自主性的背景下,实现了由管理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

由管理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转变的核心和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构建服务型政府成了解决体制机制弊端、化解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10];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11];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12];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把“建设服务型政府”^[13]作为改革行政机构的重要目标。一系列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出台,明确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模式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

(三) 从服务型治理到制度化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在坚持法治化治理、服务型治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制度化治理。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14]。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5]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变革和转型,表明了中国式国家治理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从个别向系统、从点向面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制度、法律、政策是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顺利实施的刚性机制,制度是第一位的,具有优先性,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政策化水平。治理制

度化既表明国家治理要依靠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的一系列现代国家制度,也意味着国家制度建设朝着体系化、规范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国家的制度化治理,不仅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也标志着中国式国家治理进入更加规范、更加现代化的治理新阶段。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新时代中国式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相得益彰。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16]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世界性、全球性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两步走”的重要战略部署和部署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前提下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17]。这一总体目标体现了我国走向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党的二十大基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对未来五年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明确要求,“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18]。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会发挥“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论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历史逻辑,着重从思维认知角度进行分析,各历史逻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相互替代或者否定关系。事实上,国家治理模式的每一次转变都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变革与进步,一次次的扬弃,既保留了前期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有益的经验 and 做法,又顺应时代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趋势、总要求,添加或者创新了相关内容。

纵观 70 多年来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坚持把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根本使命。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发展至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期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没有出现根本性、颠覆性错误,总体上确保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实施。

二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过程。历史考卷不同、环境条件不同,国家治理的实践路径也不同。70 多年来,基于不同阶段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中国式国家治理形成了相应的认识和思想理论,及时出台了各项制度、法律与政策来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随着环境变化和目标任务的新要求,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总结前一个历史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了指导思想与政策。

三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量的增长过程,也是质的提升过程。与国家现代化既是量的扩张也是质的提升过程一样,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上,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三个方面。特别是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经济现代化需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期待,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的角色定位越来越清晰、客体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由此可见,中国式国家治理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完善。

四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越来越规范,现代性不断增强。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其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都是渐进的、系统的,是治

理理念的持续更新,治理内容的不断丰富,治理方式逐渐规范的过程。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也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实践的时空不同,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一个时间紧、任务重、内外压力大、党和国家自主能力强的特定背景下展开的,更加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力求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

五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断学习与探索、持续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两种不同治理模式既存的背景下,进行自主探索的一项全新事业,既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要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因此,中国式国家治理是在先效法苏联模式、后吸取欧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中国特色。同时,持续地改革与创新,构成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也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进步的永恒主题。

六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 30 年、改革开放 40 年、新时代以来的 10 年,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内涵和特点。前 30 年明显体现了新政权建立初期自上而下的管制性特点;改革开放后 40 多年治理的管制性特征减少,相对平等的管理性特色增多,继而向服务型治理转变。新时代以来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的基础上,走向制度化治理新阶段。总体来看,每一个阶段的国家治理都为后续的国家治理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后续国家治理的改革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逻辑

从思想逻辑来看,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内含中国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国外治理教训等内容的思想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原创性理论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

班式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9]。因此,系统阐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逻辑不仅可以清晰地认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厚的思想底蕴,而且可以更加坚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未来可期”。

(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智慧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渊源

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讲,自秦王朝建立起大一统国家以来,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目标都致力于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无论哪个民族主政中原,最终都会认同和融入中华文化。具体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民本思想和爱国思想两个方面。其一,民本思想将人民安定与否与国家治乱兴衰联系在一起,《尚书·五子之歌》有“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维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中国各朝代兴衰的史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其二,忠君护国不仅成了历代仁人志士的毕生追求,更是爱国思想的生动体现,由不胜枚举的爱国实例凝结而成的爱国思想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性内容。深厚的文化根基规定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和“爱国主义”价值观。

从治国智慧方面讲,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指导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并获得成功,是因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汲取了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智慧,掌握了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中国式国家治理理念生发于经历了奴隶制国家阶段、封建制国家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阶段的古老中国。人地关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促使古代先哲高度关注国家治理问题。老子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创立的道家学说以“无为而治”为思想内核,倡导君主以“无为”实现国家“无不为”的大治局面。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主张以德治国,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0]并成为延续两千多

年的主流治国思想。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提倡依法治国,确立了后世治国理政的法治观。墨家思想以墨子为代表人物,从平民视角提出在国家治理中重视平等和博爱的政治思想,对于实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旧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先进性和启发性,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借鉴。上述治国思想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古代治国理政理念并在后续历史发展中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客观上丰富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工具箱”。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理论创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21]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发展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宣言,也是实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理论指导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具体而言,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并被实践证明了的伟大而科学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制度框架。从理论基础来讲,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民主集中制思想既明确了我国国家治理性质,也确定了我国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从制度建设来看,在毛泽东思想引领下中国式国家治理构建起单一制国家权力结构,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地区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2]在汲取上一阶段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注重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朝着制度化、科学化方向发展,“现代

国家治理只有依靠各种制度,才能通过制度化治理使国家治理有序化,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和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23]。因此,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4]提出我国国家治理要坚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25]正因如此,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复杂国际局势影响下和国内严峻政治风波考验中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使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继续向前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推进先进文化建设,要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不偏离航道、不变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使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分配发展成果”这一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26]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理论主线,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不断开辟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任务、总体布局 and 本质特征,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今后长期指导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五位”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不断发展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将取得更多更辉煌的成就。

(三) 国外治理教训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认知参照

现代国家治理不仅要坚持正确的治国理念,还要制定和贯彻科学的治国策略,两者结合才能在本国顺利实现良政善治,同时有效应对来自国外的各种风险挑战,保持国家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吸取苏联国家治理策略失败的教训和避免以美国为代表的错误国家治理理念,是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中重要认知参照。

作为世界上的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面临着稳定国内局势和应对国际斗争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致使列宁提出的“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实行民主。不仅仅需要民主形式的代表机构,而且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27]的正确治国设想没能落实为科学的治国策略。斯大林执政后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虽然适应了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但是在国家步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就无法适应经济常态发展与人民生活的真正需求,“斯大林模式”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僵化、结构不合理、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为苏联后来的国家治理埋下了隐患。赫鲁晓夫之后的历任苏联领导人因为都要应对日益紧张的美苏争霸局面,所以无暇顾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后期的苏联领导人由于缺乏比肩列宁和斯大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致使国家治理体制内官僚化、形式化、腐败化现象层出不穷。此外,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经济发展落后,缺乏支撑调整国家治理策略的所需经济基础,历代领导人虽然认识到这一点并分别采取了改革措施,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主政时以所谓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大力推进苏联政治

体制改革,不但没有扭转国家治理策略失败的局面,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致使国家治理走向崩溃,导致国家走向灭亡。

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虽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以维护少数上层阶级利益为目的的治国理念已导致使寡头化和工具化现象在治国实践中频出。从寡头化现象看,美国的立国《宪法》中明确提出,“为了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安宁,筹设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并谋吾人及子子孙孙永享自由之幸福”^[28],但反观美国国家治理实践发现,其国内寡头势力不断坐大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寡头资本统治的国家,各种军工复合体、企业共同体形成的‘铁三角’主导西方式现代化。”^[29]这不仅包括原住民、非洲裔、亚洲裔等少数族裔因受到政治排挤、经济压榨、文化歧视无法有效参与总统选举程序,就连美国大多数白人公民也只能按照寡头势力的安排以“选举”之名行“选主”之实。从工具化视角看,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主要目标是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服务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内,建立医疗保障、社会福利、贫困救济等制度本应是美国治国理政的应有之义,但在治理实践中,却因巨额的财政支出影响了资产阶级利益而频遭反对。民众生活境遇恶化致使美国接连爆发示威抗议、警民冲突甚至打砸抢等恶性社会事件,美国统治阶级不仅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反而以强硬手段压制民众。在国际上,美国一直以世界警察自居,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美国无端攻击和抹黑他国的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故意制造事端,造成世界局部紧张,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转移本国的治理矛盾。

苏联亡党亡国的沉痛教训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治理乱象,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而言是一面极好的镜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30]推

进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史为鉴,确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变,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三、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内含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要素的完整结构体系,这三个要素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具体而言,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未来实践中以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以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不断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 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开展国家治理活动所依据的制度和制度体系,是引导和规范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国家治理活动的基本遵循,这些制度和制度体系发挥各自特定的功能,众多制度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相互协同、共同作用,形成功能完备的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发展进步的前提要求,也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结构体系现代化和功能体系现代化两个方面。

从结构体系现代化角度来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31]。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经过发展完善已经形成涵盖各治理领域、治理环节、治理方面的制度体系。从治理领域讲,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迄今已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大领域;从治理环节讲,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形成涵盖事前动员组织、事中决策、执行和事后监督、评估环环相扣的科学程序;从治理层面来讲,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划分为执政党内外两个层面,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建立起不断规范党内制度和持续促进民主党派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结构。“国家治理体系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国家所处历史方位、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32]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根据国家治理实际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使国家治理体系结构不断优化。

从功能体系现代化角度来看,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本身不是目的,将国家治理体系运用于国家治理活动中实现治理目标才是最终目标。因此,根据现代国家治理发展规律和广泛实践可知,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功能导向作用的制度体系,主要体现在治理价值层面和治理功能层面。就治理价值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33]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性”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34]正因为始终坚持这一符合现代国家发展规律的价值导向,才使得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先进性和时代性,能够更好地凝聚民心,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实践中来。就治理功能层面而言,国家治理体系不仅需要解决国家治理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还要预防国家治理活动中潜在的风险和威胁。从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国家治理探索阶段是现代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经的阶段,这一阶段往往是各领域、各环节、各种治理活动中矛盾较突出和涉及领域较广的阶段,正因为这一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健全,从问题的产生一直到通过采用制度化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中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所以这一阶段的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功能更多体现为回应型国家治理功能。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开辟了新境界,国家治理进入了成熟定型阶段,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国家治理内容不断扩展和复杂性不断增强,在高度不确定的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在坚持已有制度优势的同时

根据国家治理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利用现代科技快速、精确地判断国家治理在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是前瞻性国家治理体系的要义所在,也是今后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二) 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

国家治理能力是将治国理政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执行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思路符合现代国家普遍规律和中国式国家治理的具体国情,回避了将国家治理能力等同于纯粹政府治理能力的西方治理缺陷。因此,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确定的治理目标要求,运用制度、法律、政策将国家意志转化为现实治理行动并取得治理绩效的能力。这四种能力主要包括“系统治理能力、依法治理能力、综合治理能力、源头治理能力”^[35]四个方面。

系统治理能力,就是协同推进各领域、各层次发展的能力。从治理领域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领域治理能力的提高都要从系统的角度进行考量,各领域的治理能力可以看作是每一个系统内各个子系统治理能力的有机结合,只有全面提高各系统内子系统治理能力才能确保各领域治理能力的持续提高。从治理的层次上来讲,国家治理能力是由宏观、中观以及微观治理能力组成的,宏观治理能力主要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建立制度体系的能力;中观治理能力主要是地方落实国家大政方针的能力;微观治理能力主要是个人、家庭为单位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提高系统治理能力就是要促进不同层次的治理能力协调发展。

依法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中运用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治理的能力。为此,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所需的各项法律法规,实现国家治理有法可依;要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手段形成法治理念、并倡导全社会使用法律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从而有效地化解各种潜在的社会风险和矛盾,实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要严格执法,不能因人因事在执法过程中出现“差异化”

现象,否则不仅会导致执法结果的不公,还会损害法律的权威。此外,要利用现代科技为执法提供技术支撑,做到执法必严。要对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违背法律法规的问题,做到违法必究,确保国家治理活动始终不偏离法治轨道。实践已经证明,依法治理能力在中国式国家治理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依法治理能力不足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实现。

综合治理能力,进一步表明了国家对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内在规律的准确把握,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各领域、各层次国家治理能力的运用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多元主体的共治能力,让政府、市场、社会在各自的领域中适时、适当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促进各领域治理能力的充分发挥和协调发展,形成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协同共治格局;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运用多种治理工具的能力,在国家治理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合理选择不同的治理工具,特别要善于不断提高现代应用新兴治理技术的能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时俱进。只有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治理能力,不断扩展国家治理能力的边界,充分发掘治理主体的潜力,科学合理地运用治理工具,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早日实现。

源头治理能力,就是要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不能只看到问题的表象而忽视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国家治理中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以前出现过的老问题还会以新的方式再次出现,但是,所有的表面问题一定都有深刻的内在缘由,如果只是单纯地根据问题的表征进行判断而忽视问题产生的源头,就无法真正看清问题的本质,不但不能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还会使旧的问题不断积累,致使新旧问题产生叠加效应,积聚更大的治理困境,甚至导致治理失败。因此,要透过表象发现国家治理活动中出现问题的根源,善于进行源头治理,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分析工具对国家治理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影响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进行提前干预,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

态,才能避免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高受到潜在风险的影响。

(三) 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

从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的结构体系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最终要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科学完备有效,国家治理能力是强是弱,最终要通过治理效能加以检验;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效能规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建构,约束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和施展。因此,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不只是对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表面性、直观性和结果性的简单理解,更是对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性、复杂性和功能性的充分考量。可以讲,国家治理效率、国家治理效果、国家治理绩效和国家治理效能都是对国家治理活动的评价性概念,对于衡量国家治理活动都有重要价值,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是不同的概念各有侧重,国家治理效能更能从总体上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出全面、综合的评价。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进行,但是,与国家治理效能相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本身不具有目的性,只具有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工具性、手段性。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是依据国家治理效能进行设计与安排的,也就是说,国家治理效能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标准。显然,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要从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意义上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要看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背后暗含的更深层次的发展要求,只有符合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式,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式决定一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反过来,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是服务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从而最终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从历史、思想和实践三重逻辑对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理论阐述,既能全面彰显“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命题的合理性,也能充分证明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第一,历史逻辑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色,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坚持和发展而来的,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炼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这对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规定性。第二,思想逻辑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亮色,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间竞争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36]的复杂竞争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就必须借鉴古代治国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汲取国外治理教训,才能打破历史周期律,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第三,实践逻辑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色,只有将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之中,才能真正指导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正确引领下积聚了显著优势,形成了以“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效能”为逻辑链条的完整实践体系,这也成为今后不断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四、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37]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前进方向。

(一) 充分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势,坚持顶层设计和分层实施相衔接、坚持长期规划和近期发展相协调、坚持总体稳定和局部调整相结合。首先,坚持顶层设计和分层实施相衔接。不仅要重视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为提升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制度支撑,还要重视中观和微观层面上这些显著优势的贯彻落实。只有将顶层设计和分层实施衔接起来,将宏观上的战略布局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其次,坚持长期规划和近期发展相协调。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规划就是要按照“三步走”战略要求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要依据长期规划制定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近期发展规划,更好地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再次,坚持总体稳定和局部调整相结合。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得来的,在今后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要始终坚持。同时,要根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适当的局部调整,才能确保显著优势持续发挥效应。

(二) 不断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式国家治理治国理政的制度前提和基础。因此,不断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激发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活力。首先,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8]坚持和发展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在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现代化,这是今后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其次,要不断增强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按照实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作用。再次,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还需逐步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应对外部挑战,充分体现我们党对于国家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实现今后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重点关注方向。

(三) 不断提升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现代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注重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畅通多元化的参与渠道和构建扁平化的沟通机制,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有的放矢。一方面,要明确国家治理能力的主体,也就是“坚持和发展谁的能力”这一问题。中国式国家治理主体主要包括“领导主体、执行主体、资源配置主体、参与主体”^[39]。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主体,要进一步强化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第二,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执行主体,要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第三,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确立市场的资源配置主体地位,为各市场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有力保障。第四,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发展壮大,它们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要坚持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要增强这四个主要治理主体的能力,要在确保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让各治理主体在各自的治理领域发挥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式,落实“依法治理”“以德治理”“基层自治”“以技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首先,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的法治能力是坚持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能力转化为中国式国家治理复合优势的必然选择。其次,我国作为拥有千年文明史的现代国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道德和文化的重要作用,采用“德治”的方式提升各类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为提高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再次,要继续发挥好我国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要按照党的二十大“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40]的要求,不断深化基层社会自治改革,激发自治潜力,提升自治能力。最后,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力量。科技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实现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寻求技术支撑。

(四) 以国家治理效能助推国家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不是绝对和静

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也不是随意的和单向的,而是以国家治理效能为衡量标准,呈现“螺旋式上升”状态。一方面,中国式国家治理向前发展的效果到底如何,还存在哪些不足和缺陷,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坚持和发展,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实现。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效能的评价和衡量作用,将国家治理效能分解到不同治理领域当中,这样不仅可以使国家治理效能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形成良性互动,而且可以让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理论命题落实到国家治理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式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依据中国式国家治理需要和国家治理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国家治理效能也需要根据国家治理目标进行适时调整,使其及时反映国家治理发展的新动向,发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作用,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向前发展。只有以国家治理效能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性转化,才能更好服务于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向前发展的需要,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

五、结语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既是对我国七十多年国家治理成就凝练而成的理论成果,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指南。通过三重逻辑的分析可知,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的逻辑优势是他国治理方式不可比拟的。可以坚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通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之路,还对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具有借鉴意义。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坚定逻辑自信,以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治国方略的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1.
- [2] 张来明. 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J]. 管理世界, 2022(5): 1-6.
- [3] 张文显.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J]. 治理研究, 2023(1): 4-27.
- [4] 吴楠.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因及其时代呈现[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35-41.
- [5] 王志强, 梁钦.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能力优势——基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6): 1-7.
- [6] 邓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12): 4-5.
- [7] 项敬尧. 中国共产党党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教学与研究, 2023(1): 56-65.
- [8] 郭伟.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独特性[J]. 广西社会科学, 2021(3): 9-15.
- [9] 牛思琦. 超越资本文明: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取向[J]. 理论导刊, 2022(8): 70-76.
- [10]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载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 178.
- [11]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载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 221.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465.
- [13]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32.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20.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512.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5.
- [17]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5.
- [1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1.
- [19]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01).
- [20]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程俊英, 蒋见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61.
- [2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6.
- [22]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J]. 人民论坛, 1997(10): 4-16.
- [23] 丁志刚, 于泽慧. 论国家制度化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87-96.
- [24] 邓小平文选[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3): 178.
- [25] 邓小平文选[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3): 256.
- [2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6.
- [27] 列宁. 列宁全集: 2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87.
- [28]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4: 1.
- [29] 丁志刚, 熊凯.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基于中西方现代化的比较[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52-61.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3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67.
- [31] 俞可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前线 2014(1): 5-8, 13.
- [32] 丁志刚.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J]. 学习与探索, 2014(11): 52-57.
- [33]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01).
- [3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9.
- [3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4.
- [36] 丁志刚, 熊凯. 国家治理: 国家间竞争的深层逻辑[J]. 学习与探索, 2023(3): 39-44.
- [37]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01).
- [3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
- [39] 谭文邦. 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内在机理和实践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020(4): 20-25.
- [4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9.

The triple logic analysi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state governance

DING Zhigang, XIONG Kai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embodi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national governance presents a triple logic: first, the historical logic from regulatory governance to managerial governance, from managerial governance to service-oriented governance, and from service-oriented governance to institutionalized governance; second,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integra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wisdom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and drawing on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foreign governance lessons; third, the practical logic which is base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entere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guided by the modernization of improving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se three logics respectively constitute the background, brightn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national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national governance, we need to fully leverage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style n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system,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lead th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national governance; historical logic; ideolog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编辑: 游玉佩]